

曾国藩文化思想简论

熊吕茂, 肖高华

(中南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所,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曾国藩作为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集大成者, 虽然他的思想中存在许多消极落后的成分, 但是他所大力提倡的经世致用的学风, 以及他所提出的“义理为体, 洋务为用”的思想, 在客观上对于开启中国近代化的大门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曾国藩; 文化思想; 程朱理学

中图分类号: K25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5-0579-04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被世人称为“一宗宋儒”, 成为晚清时期文化领域中的“领头羊”。在曾国藩的文化思想中, 他既主张“以程朱为本”, 又主张“博取众长”; 他大力提倡经世致用, 主张理论联系实际; 随着近代的西学东渐, 在如何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上, 他提出了“义理为体, 洋务为用”的思想。曾国藩作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集大成者, 虽然他的最终目的是利用儒家思想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但是, 他的思想中所具有的开放意识, 以及他在客观上对开启中国近代化的闸门所发挥的作用, 对于我们探讨曾国藩文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及其意义, 还是十分有益的。

一、笃信程朱, 博取百家

曾国藩在学术上最为尊崇且钻研最深的是程朱理学, 因而被世人称为“一宗宋儒”。道光十四年, 曾国藩就学于岳麓书院, 师从“恪守师承、门户森严”的湖湘学派理学大师——欧阳厚均先生。在曾国藩的一生中, 他终身不忘“立诚有物”的师训。后来他久宦京师, 受唐鉴及其友人倭仁等人的影响甚深。道光二十一年, 曾国藩“至唐镜海先生处, 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 先生言当以《朱子全集》为宗”^[1](口述: 八)]。这次访问对他理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曾国藩对理学的追求是极为执着的, 他一生以义理

之学为标榜。他在给友人的书札中写道: 在所有的学问中, 本人“以为义理之学最大”, ^[1](书札: 十二)]可见, 曾国藩崇尚程朱理学确实达到了虔诚信服的程度。如果进一步考察他的思想渊源, 我们可以看出, 曾国藩在以下三个方面继承了程朱理学的宗旨。

第一, “性命并重”观。“性”与“命”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两个传统命题, 是立足于人文主义, 用此阐释天人关系和人伦关系的两个基本范畴。曾国藩从伦常思想的前提出发, 将“性”与“命”两个命题并列, 撰写了《顺性命之理论》一文。他认为, “性”与“命”是立“天、地、人”三才的大本大源; 同时, 他还特别强调“性”与“命”的作用, 认为“性”与“命”不仅是“三才”之本源, 而且是一切阴阳、刚柔、动静、开合等以及人的貌、言、视、听、思“五事”的主宰。他还将“性”与“仁、义、理、智、德”联系起来, 将“命”作为维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纽带; 他不仅赋予“性”与“命”以鲜明的道德属性, 而且赋予“性”与“命”以强烈的政治属性, 使之成为维护封建宗法制度与纲常伦理关系的重要思想武器。正是曾国藩的这篇《顺性命之理论》一文被道光皇帝所看中, 他才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第二, “格物穷理”观。历史上最早对“格物穷理”做出解释的是朱熹。曾国藩继承了朱熹“格物穷理”的心物观, 指出: “格者, 即物而穷理; 如事亲定省, 物也; 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 即格物也。事之随行, 物也; 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 即格物也。吾心, 物也; 究其存心之理, 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

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教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11](家书:六)}曾国藩认为,“格物”的目的是为了“穷理”,即穷“存心之理”,穷“性命”之理,以此维护“仁义礼智”“忠孝敬慈”这一套完整的封建纲常礼教。曾国藩还继承了孟子的“性本善”论,认为“格物穷理”的目的就是“复性”。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格物穷理”仅是一种在封建社会中修身求德的手段,其目的只是为了达到“内圣”的境界,还不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

第三,“立诚居敬”观。曾国藩认为“圣学王道”的核心是“诚”,个人的涵养功夫当以“诚”为本,并将其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他说:“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无私著也……苦心中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11](日记:九)}因此,他把“诚”作为一种提高自我涵养功夫的理学思想来看待。在曾国藩的“诚——不欺——无私著——虚——物来顺应”这个理学体系中,他既继承了程朱理学的思想,又将道家的“虚静”与佛家的“入定”纳入儒学的范畴,为儒学增添了新的内容。为此,他在道光二十四年写出《主静箴》的文章,强调个人的涵养要在“静”字上下功夫,而达到“静”的重要途径就是“耐”。然而,曾国藩理学中的“静坐”与道家的“虚静”和佛家的“入定”的涵义却是不同的。他认为,“静”的目是蓄养力量,“静极生阳”,而不是由“虚”而“无”。曾国藩在《居敬箴》一文中还提出了“居敬”的主张,认为“女之不庄,伐生戕性”^{[15](文集:十五)}。在这里,曾国藩的“居敬”与“立敬”一样,同样是达到“立诚”的一种手段。同时,他的“敬”的范围也很广,既包括一个人外表的严整,又包括一个人内心的专一;既包括一个人为人的慎独,也包括一个人处事的谨慎。总之,曾国藩认为“诚”可以化育天地万物,求“诚”须“不欺”,“不欺”必能居敬慎独,居敬慎独者必无私著,无私著者必中虚,虚必静,静生阳,阴阳来复,见谓天行。当然,曾国藩“立诚居敬”的目的还在于通过它来实现“仁”“义”,以此来维护体现封建宗法制度的“礼”;他把“诚”称为“圣人之本”和“五常之本”,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驱使人们去为风雨飘摇中的晚清王朝卖命。

然而,曾国藩并不像传统的理学家那样门户森严,他对儒学中的不同派别及其它学派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这可以说是曾国藩的一大特色。

首先,曾国藩主张“汉宋兼容”。他认为,“笃守程朱,不废陆王”不失为治学的好方法。在历史上,宋学和汉学曾经是对立的,宋学斥责汉学为“支离破碎”,汉学斥责宋学为“空疏无物”。到了清代的中叶,汉学和宋学发展成为经学中的两大学派。而作为“一宗宋儒”的曾国藩,自然不会以汉儒为独尊。但是,他又认为,同是作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汉、宋两大经学学派,不能再“同室操戈”或“互相轻薄”。于是,他提出了“不废汉学”的主张。尤其是到了道光末年,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震慑下,为了协力剿灭太平军,曾国藩主张“克己和众”,扫除门户之见,会通汉、宋之学,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兼容汉、宋之学的目的,不是单纯从学术的角度出发,而是为了现实政治服务的需要。

其次,曾国藩崇尚“取道法佛”。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曾国藩在“诚”的理学体系中,把道家的“虚静”与佛家的“入定”引入了儒学之中,并主张对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择其长而用之。他认为,“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11](日记:十)}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需要,他从多方面吸取思想养料,以加强统治之术。如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过程中,他曾借重法家的思想,在给澄沅两弟的信中,他说:“目前处弟之地位,除一力向前勤劳之事,别无二计,身之病否,家之安否,均当看轻。”^{[11](家书:六)}他认为,在危难之际,以“硬”蓄“德”,不失为一种好的权益之计。在这里,曾国藩将法家思想提高到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曾国藩“笃信程朱,不废陆王”、对诸子百家“兼容并蓄”的思想,在学术上来说具有很大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其一,它加强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改变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同室操戈”的状况,从而达到在一个统一的思想指导下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及各种反清势力的目的,使当时一度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也因其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而被称为“中兴名臣”。其二,它有利于打破学术上那种僵死的门户森严的局面,使人们开始重视西方的科学技术。在19世纪中后期,人们的思想又重新活跃起来,这与曾国藩所提倡的“兼容并蓄”的思想无疑有

着密切的关系。

二、经世致用,物穷则变

在嘉庆、道光年间,理学经世派的倡导者,首推陶澍、贺长龄和魏源等人,他们的思想对曾国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如综核名实;今日言学术,则莫如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11](书札:十三)}这充分体现出他讲求实际、注重实践的价值取向。为了突出经世致用思想在理学中的地位,曾国藩进一步发展了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三门之学,将学问分为四科,指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代掌故皆是也。”^{[11](文集:十五)}曾国藩将学术一分为四,并把“义理”摆在独尊一统的位置,这就大大提高了经世致用的学术地位。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经济即在义理之中”的思想。如前所述,曾国藩继承和发展了姚鼐的“三门之学”,将“经济”与这三者并列,强调了“经济之学”的重要性,认为“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都是宜考究的“天下之十四宗大事”;他从理学家的立场出发,将经世实学融于义理之内,认为义理与经济是体与用、内与外、德与功的关系,指出“苟通义理之学,则经济该乎其中矣”^{[11](文集:十六)},强调“经济之学”存在于义理之中,并在义理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二,“以礼经世”的思想。一般来说,“礼”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礼,主要指约定俗成的仪轨活动方式;而广义的礼,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而儒家传统中的“礼”,是指一种社会制度及现实的规范秩序。从儒家“礼”的思想来看,其核心是“仁”,且内涵非常丰富。如: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仁者人也”,社会要走向“仁”道,就必须造就一大批“克己复礼”的“圣人君子”去对不行“仁道”的行为进行斗争;此后的孟子、荀子和程朱的宋明理学也十分重视“礼”的重要性。曾国藩在吸取前人理学大师“礼”

的思想的基础上,将理学家奉为世界本原的抽象的“礼”具体化为具有实践意义的“礼”;在他看来,“礼”上承理学的“义理”,下则通过具体的规则规范天下万事万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所不包,“礼”就是“经济之术”,就是“治世之术”。此外,曾国藩还将“礼治”运用于政治和军事之中,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尤其是他将“礼”的思想灌输到湘军的训练中,从而使湘军这支没有国家军饷的地方军队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

由上可见,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呈现出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曾国藩的“以礼经世”,集中反映了他极力维护封建纲常礼教和封建统治的思想;另一方面,他把诸如“财用”“盐政”“漕务”等列为“天下大事”之一,这体现了他注重实际的精神,对社会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义理为体,洋务为用

我们知道,近代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中西文化大碰撞的时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英国的侵略,曾国藩表现出了强烈的仇夷情绪。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失,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11](家书:八)}此时,由于仇视洋人的侵略,他还没有想到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直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在与洋人交往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力,曾国藩才重新审视西方文化,在西学东渐的形势下,逐渐形成了“义理为体,洋务为用”的思想。

首先,曾国藩认为,之所以主张“义理为体”,是因为向西方学习的前提和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纲常礼教的地位和封建地主的统治。在他看来,“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11](书札:十三)}他认为,并不是中国传统的礼乐教化不如洋人,而只是中国的器械不如洋人,因此,中国文化中要变的只是器用层面及制度层面的某些外沿部分,而作为伦常层面及制度层面的核心部分则不能变。他强调封建的纲常礼教是中国的立世之本,是永恒的,不可以变的,不仅不可以变,而且还必须强化,学习“西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巩固中国封建纲常礼教的地位和封建地主的统治。

其次,曾国藩认为,之所以主张“洋务为用”,是因为在与洋人的交往过程中,他看到了西方列强洋枪洋炮的威力,而这些都是中国所不可比拟的。于是,他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口号。曾国藩认为,要保全中国的封建制度,仅依靠固有的传统文化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突破“夷夏”的界限,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此,他提出了“制器、学技、操兵”三大自强之道。在他看来,作为泱泱大国的清朝屡受“外夷”欺侮,其原因是武器装备不如人,“兵无利器,无异于以卵击石”。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安庆内机械所,这是中国当时第一个近代化的军事工厂;1862年,他组织人马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1865年,他又创建了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艘大型新式兵舰——“恬吉”号,使江南制造总局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曾国藩甚至预言,如果“各处仿行之,渐推渐之”,就可以使军事工业成为“中国自强之本”^[1](书札:十三)。同时,他还派遣大批留学生到西方国家留学,并在国内设立西式学堂,倡导西方教育。曾国藩将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设想变成了现实,因此而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尽管曾国藩从事洋务运动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是他所开启的洋务运动,毕竟使中国迈出了走向近代化的步伐,在客观上为以后的资产阶级运动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四、结论

曾国藩生活在一个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的历史

时期,因此,他的文化思想带有明显的双重性。

其一,曾国藩既是“一宗宋儒”,笃信程朱理学,极力维护封建的纲常礼教,又能博采众长,吸纳百家,具有一定的开放意识;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同时又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近代文化的一代新风,使以后的资产阶级运动无不受到其文化思想的影响。其二,曾国藩的经世致用思想同样表现出“卫道”与“创新”的双重特点。他认为封建的纲常礼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这就使他的思想带有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色彩;同时,他又是洋务运动的创始者和实施者,正是他所提出的“洋务为用”的口号,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闸门,并为他的继承者张之洞等人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使洋务运动的理论更加趋于完备。

其三,曾国藩的文化思想既有许多落后、保守的东西,又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他顽固地坚持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为封建的纲常礼教歌功颂德;同时,他的文化思想中所包含的合理内核,如在学术上所提倡的“博采众长”的学风,在实践中所提倡的“经世致用”、讲求实效的作风,对于我们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的指导下,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还是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长沙: 岳麓书社, 1994.

On Zeng Guo-fan's cultural thoughts

XIONG Lü-mao, XIAO Gao-hua

(History and Culture Institut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Zeng Guofan was the last scholar who gave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to confucianism. Although there were many negative factors in his thinking, “theory is applied to practic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fundamental” and “modern western culture is applied to practice”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objectively in his time.

Key words: Zeng Guo-fan; cultural thoughts; Chinese modernization